

论绿原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时期的诗歌创作

吕晓洁

摘要：本文以“七月派”诗人绿原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时期的诗歌创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也涉及同时期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其它几位“七月派”诗人的诗歌，及诗人返京后有关向阳湖的回忆录、重返诗坛后的诗歌创作，从社会历史与文本细读的视角探索绿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的创作轨迹与心路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干校文学现象及文学史中的一些重要现象进行重新思考。

关键词：向阳湖；绿原诗歌；现代意识；七月诗派；干校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2-0140-05

绿原是“七月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诗人在50年代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狱中度过漫长的七年光阴，1969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在干校生活五年，直到1974年返京。向阳湖这段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也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篇，并极大地影响了他复出后的创作。

—

绿原曾谈到他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期间的诗歌创作，“记不得在什么偶然情况下留存在练习簿上，看来并没有真正作为诗来写。唯其如此，它们作为心迹来说，便更显得真实了”^①。可见这些诗歌是诗人当时心迹的自然流露，正是这种自然流露更能折射诗人当时的真实心境。五年的干校生活对于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有着重大影响。“绿原在文化部湖北咸宁干校五年，应当说还是很有收获的，他长期接受劳动锻炼，接触农村的艰苦生活，同全党全民一起遭受这场劫难，促使他思考了一些问题，他的思想感情又经历了比七年隔离更其深刻的变化”^②。干校生活触发了诗人的灵感，也触发了他对社会、人生、命运的重新思考，生命和灵感熔铸而成的诗篇更为引人注目。

《重读〈圣经〉》写于1970年，即作者下放湖

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第二年，存在意识是这首诗迥异于诗人以前诗歌的异质性特征。“常是夜深人静，备感凄清，/辗转反侧，好梦难成，/于是披衣下床，摊开禁书，/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孤独凄凉是刺激诗情的一个重要诱因，诗人所有的书全被抄走，这里不需要书本，也不需要太多的文化，需要的是丢掉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与清高，真心实意脚踏实地接受再教育。幸亏查抄者漏掉了一本《圣经》，可以打发作者那漫漫长夜里的深深愁绪，正是这样的孤独失意使诗人有机会沉潜到思想最深处去审视那颇具荒谬意味的现实人生，发出对于人生命运的愤怒质疑。诗人都读到了什么呢？“为人民立法的摩西”，“推倒神殿的沙逊”，“狮穴中走出走进的丹尼尔”，“彩衣斑斓的约瑟夫”，“血战到底的大卫”，“老年痴呆的所罗门”，还有“拿撒勒人耶稣”，沦落风尘心如钻石的“妓女马丽娅·马格黛莲”，“罗马总督彼拉多”以及良心尚未丧尽的出卖耶稣的“倒霉的犹大”。反抗者、叛逆者、征战者、拯救者、背叛者、忏悔者等等各色人物纷至沓来，正如诗人身边变幻不定的现实人生，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里面见不到什么灵光和奇迹，/只见蠕动着一个个的活人。/论世道，和我们今天的几乎相仿，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诗中世界与现实世界，“世道相仿”，“人品殊异”，作者对

于今天人们的不屑，正是特殊环境中复杂心态的折射，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方，无可奈何的处境，一颗受伤的心，欲说还休的情绪，知识分子固有的高傲，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却包含了十分丰富纷乱的心绪。诗人对拯救者表示了无限的钦敬，“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同情受难者，“拯救一切痛苦的灵魂”，“幻想移民天国，好让人人平等”。即使在这样令人尴尬的场景中，作者仍然没有舍弃对于正义、良知的呼唤，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基本道义的坚守，这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显得尤为可贵。

这首诞生在特殊境遇里的诗歌凸显出强烈的存在意识，作者身处逆境，屡屡遭受坎坷，无数的精神折磨促使他对于人的存在进行冷静的思考。作者在此窥见了人的生存本相，一切战斗，一切的反抗好像都是徒劳，人类始终都是在劫难逃，因为人类在不断地自造困境。基督教向人们所展示的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空间，上帝不可能成为人类的保护神，人们以自己的虔诚向虚幻的上帝祈祷、请求救助无异于画饼充饥，人类自身制造的灾难永远不可能靠上帝获得救赎。诗人在乎超越了个体痛苦，体验到了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痛苦。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今天，马丽娅·马格黛莲注定永远蒙羞，/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今天的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不可捉摸。尽管如此，作者于绝望中仍生出了些许希望，“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但是“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诗里凸显的存在意识、孤独情绪、荒诞感觉、反抗精神以及强烈的象征意味，使这些诗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意味，同一时期的其它诗作中都有这种倾向，迥异于诗人在四五十年代初的诗作，它远远逸出了“七月派”诗歌的一般诗风，是“七月派”现实主义诗风的变异与深化，也是诗人创作生命的新起点。巨变的历史，扭曲的人性，特殊的遭遇是诗歌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诗人经历了人生的大磨难，不再像40年代那样激情奔放，不再有急于破坏一切与重建一切的激烈情怀，面对严峻现实，一腔热血化作理性的沉思与审视。此外，诗人很早学习英语接触外国文学，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早期诗集《童话》中曾反复出现“冷雨”、“暗夜”、“野火”等荒原意象，使诗笼罩了一层现代主义意味，后因特殊时代影响这种诗绪几乎中断，如今又得以重续。

另一首诗《母亲为儿子请罪——为安慰孩子们而作》，呈现出浓重的荒原气质。“冰冻的玻璃”、

“万籁俱寂”、“风雪交加”、“夜”、“污泥和阴霾”、“无光、无声、无色的混沌”这一系列冷硬的意象，赫然组成了一个沉寂荒芜的世界，弥漫着抑郁冷寂的情调，这是对一个错误时代的彻底否定，但这种思想表达得极其曲折，似是母亲在为儿子请罪，其实是对于世界荒谬的指责。存在本身成了罪证，“我哪知道这可悲的世界 / 他的罪证就是他的存在”。这首诗的格式也别具特色，每个诗句后面都没有标点，整首诗几乎就是一句没有终止的话，构成一个象征体，象征荒野般的世界不知何时终结。

面对如此无奈的现实，绝望与渴望的交织是作者此时的主要心态，“我将钻进隧道里去 / 去摸寻为黑暗做锦标的银盾 / 我又将在洞口昏倒 / 等‘光’把我拍醒 / 我钻的隧道是人生 / 我摸的银盾却是悲惨 / 我到的洞口是坟墓 / 我等的‘光’却是平凡”（《我的一生》），“隧道”、“黑暗”、“坟墓”是晦暗人生的写照，“等‘光’把我拍醒”，无奈之中又透着对于光明的渴望。《谢谢你》中“一个看不见的微笑 / 就像二月的阳光 / 穿过冻云 / 亲切地抚摸着 / 被践踏的麦苗”，见到了太多的敌视与背叛，见到了太多的冷眼与不屑，这悄悄的一个微笑是如此珍贵，有如春风拂面，又如阳光送暖，竟然激起诗人无限的遐思与柔情，屡遭劫难的诗人的一颗诗心仍未麻木，对于爱与温暖仍是那样的敏感。

压抑之下的力量奔突则是《信仰》这首诗的主要特征，“我是悬崖峭壁上一棵婴松，你来砍吧 / 我是滔天白浪下面一块礁石，你来砸吧 / ……哪儿你也追捕不到我 / 怎么你也审讯不出我 / 你永远也监禁不了我 / 在梦里你也休想扑灭我 / 即使——上帝保佑你 / 一并取走这个人的生命”（《信仰》），“悬崖峭壁”、“滔天白浪”、“万仞海底”、“北极冰圈”这些意象，构成了一个严酷的生存环境，这样严酷的环境更显出主人公抗争的勇气。那种不怕一切的执著姿态，那种无所畏惧的斗士形象，那种重压之下的反抗力，又闪现出“七月派”诗人的一贯气质。一个时代在一个人身上的投影，短时间内是难以磨灭的。带着强烈的情感介入现实、提倡苦斗，强烈的使命感是“七月派”诗人的整体风格，因为这一派诗人当时大多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在光明与黑暗生死抉择的年代里，同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同成长着，“他们带着战斗的人格、灼人的诗情，怀着所向披靡的气概登上诗坛，促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又一次勃兴和繁荣。他们注重从社会历史的方面把握生活，把诗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把诗

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与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表现时代与个人的真情实感，注重艺术的开放性和独创精神”^③。

强调诗心与现实的结合，推崇个体主体性，强调主观突入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不论字面有没有我，任何真正的诗都不能向读者隐瞒自己，不能排斥诗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抒情，排斥了主观抒情就排斥了诗”^④。这些美学追求在诗人此时期的创作中都有保持，不过已融入了新质，蜕变出新的诗风。逆境激发出他对民族悲剧的思考，使郁结的诗情找到了新的爆发口，出现了新的飞跃。《给一个没有舌头的人》，通过一连串的对话式书写，犀利的责问与沉重的回答表达出那种隐忍却又欲爆发的矛盾，诗歌内部充满张力，显现出无奈之下的顽强不屈。作者早年曾在《诗人》中写道：“有奴隶诗人 / 他唱苦难的秘密 / 他用歌叹息 / 他的诗是荆棘 / 不能插在花瓶里 // 有战士诗人 / 他唱真理的胜利 / 他用歌射击 / 他的诗是血液 / 不能倒在酒杯里”。“战士诗人”是绿原的生动写照，即使遭受无数打击，被剥夺了话语权，仍在“唱真理的胜利”，仍在“用歌射击”，是个体难以对抗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情况下，个体在灵魂深处的搏斗。

二

回溯绿原的诗歌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一些贯穿始终的质的东西，那就是对于现实、真理、诗的执著情怀。绿原在读初中时接触到鲁迅作品，“便悄悄地爱起鲁迅来”，此后一本本地读鲁迅的书，“我想无非就是，先生一辈子为了唤醒同胞，鼓舞他们向前向上，并向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正是为了这个庄严的目的，他充分发挥了文艺作为手段或武器的性能；先生从来不为艺术而艺术，但也从来不为某一主题思想而牺牲艺术，他的思想和艺术永远融为一体，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他全部的最高的艺术才能。伟大的志向，宽广的胸怀和高超的艺术才能的统一，应当是他对后辈最基本的诗教吧”^⑤。“向黑暗势力作斗争”、“思想与艺术永远融为一体”，这可以说是鲁迅对于绿原一生最重要的诗教了。

绿原在抗战时期开始诗歌创作，第一部诗集《童话》“试图用朦胧的语言来表达当时同我一样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人的苦闷和追求”^⑥。诗中有很多美丽幻想，也不乏对于现实的冷静体察，很多

诗篇表现出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立并存的反差现象。如《小时候》， “做一个流浪的少年， / 带着一只镶金的苹果， / 一只银发的蜡烛 / 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 / 旅行童话王国， / 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但是，妈妈说： / ‘现在你必须工作’”。诗里面满是奇思妙想，俨然一个童话王国，然而，生活的真实使诗人无法真正流连于童话王国，结尾一声断喝，把梦幻击成了碎片。这与作者的童年经历是紧密相连的，绿原出生在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父亲在他三岁时便离开了人世。母亲和四个姐姐依靠比他年长十九岁的当教职员的哥哥过活。他们住简陋的木楼，“绿原的家里，充满了灰尘、煤屑和动荡不安的气氛。火车日夜隆隆地带着一阵阵的旋风，从他家的屋顶上急驰而过，他时刻觉得有被冲倒碾压的危险。他的床铺和书桌不停地抖动，小学课本上布满了抹不尽的灰尘。深夜，他常常被凄厉的汽笛惊醒，久久睡不着……他就在这时刻有被冲倒和碾压的危险的震荡空气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⑦。艰苦的生活环境形成了他敏感自尊的气质，和对美好世界的渴望，同时也让他对于现实有着更为具体的认识，可以说，作者的创作一开始就是与对现实的思考紧密相联的。“杀死那些专门虐待着青色谷粒的蝗虫吧， / 没有晚祷！愈不流泪的， / 愈不需要十字架； / 血流得愈多， / 颜色愈是深沉的。 / 不是要写诗， / 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憎恨》），诗作已流露出对于现实的愤怒与反抗。

随后作者被裹挟到了时代的洪流之中，《集合》与《又是一个起点》，充满时代的狂躁气息，诗人善用紧锣密鼓般的节奏带着满溢的激情，使一首首诗如同一枚枚炸弹在空中爆裂，有着很强的冲击力，是最能体现出“七月派”诗风的作品。正如唐湜所言：“他们赤裸裸地从人生的战场上奔跑而来，带着一些可爱的新鲜气息与可惊的原始的生命力，掷出一片燃烧着青春的呼喊与崭新的生活感受。”^⑧其诗作一直有股原始的力在冲撞，“一排钉靴 / 踏过去！ / 要这条穿兽皮、插羽毛的街秩序大乱 / 而且， / 破坏！ / 对他们已经决裂了 / 谁再侍奉 / 那些被滋养成和食欲所毒害的上流社会？”（《破坏》）诗里充满破坏一切的力，召唤人们起来破坏那个丑恶的不平世界。“中国，你不知道吗 / ……你的城市像果实一样，现在腐烂了 / 你看，将你从血污里救出来 / 戒绝你底鸦片瘾，医治你底牙痛 / 然后扶你站起来的是 / 那些孤哀地活在你底乳房外边的 / 最渺小而又最勇敢的 / 众大的人民……”（《集合》）呼唤“受难的人民集合起来”，将灾难深重的祖国

拯救出来，有什么比这更能喊出当时人们的心声呢？“所有的/战斗的新娘们！/起来，为了/自由与饥饿/对你们的管理者罢工吧！”（《复仇的哲学》）悲愤、反抗是这些诗作的主要基调。也因此，有一些战斗诗篇缺乏锤炼，流于激情呐喊。

诗人执著于现实、执著于诗，是与对真理的追求紧紧连在一起的。绿原写道：“人必须用诗寻找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⑨在诗人眼中，真理就是至上的标准，“在真理面前，/伽利略是人的标准”。因此，诗人要为真理而斗争，“斗争养育着生命：/胜利一定与我们同在！/站在断头台前/我们微笑，/我们不祈祷！”（《信仰》）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正是基于真理之上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才使作者在狱中写出了《又一名哥伦布》，在干校期间写出了《重读〈圣经〉》与《信仰》那样充满独立精神的诗篇，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个性坚守。

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和绿原同时期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的“七月派”诗人牛汉、曾卓等，他们的诗歌创作同样保持了独特的个性，在同时期的干校诗歌创作中卓尔不群，而且此时期的创作水平都超越了前期创作，成就了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半棵树》、《华南虎》等作品比前期创作更加深刻，艺术水平更高，牛汉自认为他这时期的诗歌是“迄今的作品中仍然是属于最好的”。牛汉曾谈到，《半棵树》是在向阳湖时受到冯雪峰形象的激发而写成的，“我在水泵房前看见冯雪峰，悲苦、坚韧、正直，活像被劈了一半的半棵树。1972年我的短诗《半棵树》就是写当时的感觉”^⑩。那“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树叶”的形象，给人强烈的冲击。雷劈去了一半的树，在荒凉的山丘上，“侧着身子挺立着”，它在坚守，坚守心中的那份信念，这既是给苦难中的冯雪峰画的一幅肖像，也是作者的一幅自画像，诗中透出的那份顽强与执著，那份永不低头的顽强精神，使“诗歌的生命意识尤为突出”^⑪。半棵树的形象成了永不凋谢的常青树，永远地挺立在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曾卓《悬崖边的树》中的树的形象，就是受难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被“奇异的风”吹落在悬崖边上，稍不小心就

会掉下去粉身碎骨，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要么自甘沉沦深渊，要么抗争，那“振翅高飞”的形象正是无声的抗争，是作者内心意志力的表现，“寂寞地站在那里/孤独而又倔强”，正是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是对他们人生际遇的生动诠释。“悬崖”、“鹰”、“树”的意象同时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颇有意味：“悬崖”含险峻之意，指一种人生处境；“鹰”有翱翔与搏击之意，指向自由渴望；“树”有挺立、生命之意，代表一种生命姿态，这些一同构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隐喻，成为那个灾难时代留给历史与后人的杰作。几位“七月派”诗人的创作，标示着干校文学的丰富与深刻的一面。

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在此特殊时期的创作表现出的鲜明个性，诗中那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那种受难者的形象，诗中的现代意识等，呈现出迥异于同时代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原因何在？首先，一个个性倔强的优秀知识分子是富有坚守精神的，至少他不会随波逐流。“七月派”诗人大多深受鲁迅的影响，有一些还是鲁迅研究者。他们身上都有鲁迅的战斗精神、不妥协精神。其次，当时下放“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有几类，有的是无重大过错但需要下去锻炼的一般干部；有的是“反革命分子”如冯雪峰等需要“改造”者。“七月派”诗人皆因胡风事件被列入“反革命集团”，因此去“五七”干校则有在人民的监督下“改过自新”的惩罚性质，他们不可能有热情跟在别人后面唱赞歌。最后，当时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除了马列主义著作之外，其它的书都不准看，白天干各种农活，晚上学习批判。那没有希望、没有自由的荒谬日子，促使他们对于现实作出思考。经过长期的磨练，前期热情的呐喊与战斗的直白已沉淀为含蓄的表露与理性的沉思。

干校是我国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一段历史是不容忽视的，由此而形成的干校文学创作也无法让人遗忘。当时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集中了6000多名文化界人士，包括著名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等；著名诗人郭小川、李季、臧克家、绿原、牛汉、曾卓等；评论家侯金镜、冯牧、许觉民、阎纲等；另外还有翻译家、编辑及其他学者与家属等等，这种罕见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下放一个地方去接受劳动锻炼，是从行动到精神上对他们的全盘规训。福柯认为权力必须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通过监视和观看，个人被对象化，被观察，被记录，被铭写。”^⑫

这样，规训对象才能更好地被监督，被控制。在这里不能擅自行动，不能私自通信，不能看除了马列著作以外的书，不能乱发“反革命言论”，被规训过的话语只是僵化一致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了。

福柯认为，在规训过程中使用规训权力的手段之一是规范化裁决，这是在这个权力网络内的一种内部处罚，“它的处罚对象包括时间、行为、活动、言语、身体和性方面的不合规范的出格行为。对这些不合规范行为做出的处罚，可以使规训（纪律）保持严格尺度，适当标准，整齐压力，以便让规训对象纳入一个同一整体中，使其行为和身体规范化，标准化”。当时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劳动、学习、批判，大家步调一致，消除个性，若有反抗，便会受到惩罚，写检查、挨批斗是常见的惩罚方式，被规训着的知识分子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困难的。

尽管当时一些极端分子费尽心机，然而，知识分子只能暂时被驯化，在压制的下面潜藏着不屈的灵魂。由此，再来探讨绿原等人在干校期间的创作就有了更加不同一般的意义了。

绿原新时期重返文坛，“干校”时期的诗歌得以面世，这些诗是诗人苦难历程的见证。时代的巨变再一次激活了诗人内心潜存的诗意，绿原再次创作出了大量的诗篇。“刚刚从一段荒谬而虚假的岁月中跋涉过来，几乎每一个受难的诗人都从生命的根底里体悟到‘真实’二字沉重的分量和珍贵的含义，无论是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他们大都能够从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出发，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唱出发自内心的音律”，经过生命与艺术的再生，新时期的诗少了些粗犷，更多了些哲理感悟，《歌德二三事》、《终于没有揭开神像面纱的席勒》、《咳，海涅》等诗都体现出了诗人对历史、生命、人生的思考。

诗人在新时期诗歌创作中继续保持了独立品性，不随波逐流，坚持诗歌艺术与人格的一致，他说：“我从四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写诗。最初只是把诗当作玩具，或者当作与美捉迷藏的游戏，或者当作消愁解闷的手段。无论当作什么，都丝毫没有帮助我，感受到古代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人生的痛苦。直到后来我被投入民族和人民为求解放而不得不进行的残酷斗争，才逐渐抛弃那些幼稚的幻想和嗜好。自从我懂得一个诗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诗便日益成为我试图在苦难和斗争中探索人类精神美的途径或桥梁。这时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正是

在这个信念的告诫下，我始终羞于以轻佻的态度接近诗，例如利用诗去追逐个人的名利。”^⑩正是这颗对诗的敬畏与虔诚之心，使诗人总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

研究绿原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期间的诗歌创作现象，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如何对待干校期间的文学创作问题？干校文学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政治、文化现象的折射，是一群文化人特有的心路历程的反映，处在特殊年代的干校文学虽然数量不多，但同样显示了它的丰富性与独特价值，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文学现象。干校文学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文革”文学不足以将其整体涵盖。其次，如何看待一个诗歌流派的问题？如“七月派”诗人，不能止于一般的归纳概括，他们的创作千差万别，各自在不同阶段的创作也有很大差别，加强个案研究，开掘其诗歌创作的丰富性，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注释：

① 绿原：《快乐的火焰》，《绿原自选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2 页。

② 罗惠：《我写绿原》，《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 5 期。

③ 龙泉明：《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文学评论》1988 年第 3 期。

④ 绿原：《白色花序》，《绿原文集》，武汉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8 页。

⑤⑥ 绿原：《人之诗·自序》，《绿原文集》，武汉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5、234 页。

⑦ 牛汉：《荆棘和血液——读绿原的诗》，《文汇月刊》1982 年第 9 期。

⑧ 唐湜：《诗的新生代》，《诗创造》1948 年第 1 期。

⑨ 绿原：《诗与真》，《绿原文集》，武汉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3 页。

⑩ 何启贤、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66 页。

⑪ 刘保昌：《干校文学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

⑫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等译，三联书店 2010 年第 5 期。

⑬ 这是 1998 年 8 月 22 日绿原在马其顿共和国斯特朗加诗歌节第 37 届金环奖授奖仪式上所致的答谢词。

作者简介：吕晓洁，女，1972 年生，河南泌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